

邱格屏 著

世外无桃源

东南亚华人秘密会党

司公信松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邱格屏 著

世外无桃源

东南亚华人秘密会党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外无桃源:东南亚华人秘密会党/邱格屏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9
ISBN 7-108-02002-5

I. 世… II. 邱… III. 公党-华侨组织-研究-东南亚
IV. D634.3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87984 号

责任编辑	文 静
装帧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京鲁创业科贸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3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2.75
字 数	285 千字
印 数	0,001 - 4,000 册
定 价	25.00 元

总 序

张宪文

南京大学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决定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合作，连续出版本学科教师的科研成果和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这对于繁荣学术事业，促进同行间的学术交流，推动本学科的建设，是十分有益的。

南京大学的前身，是著名的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两所大学都有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传统。早年，陈恭禄、郭廷以、罗尔纲、王弼等著名的史学大师，曾在这里执教。陈恭禄教授的《中国近代史》是近代中国历史研究的开山之作，有着积极的学术影响。他的近代史史料学研究，帮助许多学子训练了扎实的基本功。罗尔纲教授是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奠基人，他的研究成果享誉海内外。郭廷以

教授去台湾后，培养了一代学术精英，活跃于台湾史坛。王栻教授的维新运动史与严复研究，在学界很有影响。毫无疑问，陈恭禄等教授是我国近代史研究的先驱和开拓者。他们的学术成就、治学精神和学术风范，也奠定了南京大学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发展的基础。

改革开放后，我国学术研究突飞猛进，学术事业更加繁荣。茅家琦教授执本学科牛耳，带领全体教师，继承和发扬前辈学者严谨、求实、勤奋的学术精神，锐意进取，不断创新，逐步形成本学科新的研究特色和学术风气，并在若干研究方向上，跨入学术界前沿。主要研究方向有晚清史、太平天国史、中华民国史、近现代中国社会史、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近现代中国经济史、长江下游城镇经济发展研究、近代秘密社团研究、当代中国研究、当代台湾研究，等等。

晚清与太平天国史，是本学科的优势。茅家琦、方之光、崔之清教授，继承先辈成就，利用南京的地缘特点，将这一研究方向推向学术界前沿，获得了引人瞩目的学术成就。其中代表性的著作有《太平天国全史》、《太平天国战争全史》等。展示了太平天国史的最新研究成果，在海内外具有强烈的学术影响，本学科遂成太平天国史研究之重镇。

近代秘密社团研究，是本学科的又一特色。蔡少卿教授带领一批研究生，不仅对遍及大江南北的哥老会、天地会、红枪会等民间秘密

组织——做了探讨，提出了有价值的成果，还将研究视角转向当代黑社会研究，从一个方面为改革开放和实现国家社会的稳定，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

20 世纪 80 年代初，江苏省有关部门敏锐地觉察到当代台湾研究的重要性，多次建议南京大学成立台湾研究所，可是迟至 1991 年才正式建成。当时，茅家琦教授曾动员我和他一块儿去开垦这一领域。可是我仍留恋于 1949 年前的中华民国史研究，未为其所动。茅家琦教授乃带领一批研究生写出了颇具影响的《台湾三十年（1949—1979）》和《80 年代的台湾》两部著作。多年来，这一研究领域在崔之清教授的积极推动和指导下，培养了大批博士生、硕士生。这些学生毕业后，多数活跃在全国各地对台工作的岗位上。南京大学的涉台研究，为有关部门提供了有力的政策咨询，在海峡两岸产生了广泛影响。

中华民国史，是本学科的重点研究方向。目前我们正在整合本学科的主体力量，形成更为强大的学术群体，以发挥集体优势。

1971 年周恩来总理即再次号召研究中华民国史，1972 年，李新教授率先在中国科学院（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组建民国史研究室，开始着手研究民国史。翌年，李新教授派尚明轩研究员等来南京大学找我，协商共同参与民国史的研究活动。当时，尚值“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华民国史的研究仍有相当的政治敏感性。但是，我们凭着追求学术真理的愿望与信念，积极地予以响应。南京曾是中

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所在地、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首都，有独特的地缘优势和丰富的民国档案图书资料，完全有条件大力开展民国史研究。我们在艰难局面下，逐步引导教师投入民国史研究，并从最初的单纯研究民国人物，向更广阔的研究领域展开。1983年，在历史研究所内成立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它成为中国大陆地区最早从事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学术机构之一。1984年，南京大学与兄弟单位共同发起召开首次中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在海内外特别是台湾引起了强烈反响，吸引了更多的学者涉足民国史研究。次年出版的《中华民国史纲》，在无任何范例借鉴情况下，初步勾画了民国史的学术框架和体系，在众多的历史问题上依据第一手档案，提出新的观点 and 解释，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良好影响。史全生教授在民国经济史、文化史研究领域颇具造诣，其研究成果，对民国史方面的建设做出了贡献。

1993年6月，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正式成立。“中心”的主旨在进一步提高民国史研究学术水平，加强海内外学者的学术联系与交流。“中心”聘请了海内外一批学术上卓有成就的学者为客座教授，出版了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刊物《民国研究》，承担了一批国家级和省部级的科研项目，主办过多次民国史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先后出版了《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蒋介石全传》（上、下册）、《中华民国史大辞典》及《中华民国史丛书》等一批具有较高水

平的学术专著。

2000年9月，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通过了教育部派专家组考察与评审，被批准为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在研究项目、经费和人才培养方面，均获得重点扶持。在教育部社政司、南京大学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在本学科教师共同努力下，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正在稳步向前发展。我们以承担多项教育部重大科研项目或重大攻关项目为契机，积极调整、整合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力量，并吸收海内外学者来“中心”兼职，在中华民国史领域内开展更为广泛的学术研究，以期出现更多更好的创新成果。

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围绕教育部重大科研项目，力求在若干方面的研究上取得突破。其中，我们在政党社团特别是中国国民党史研究方面，摆脱纯发展史的研究局限，着力研究该党社会结构与权力结构的演变，研究该党的政治理念与党务运作。在经济史的研究方面，把重点转向长江下游中等城市现代化研究、农村社会变迁研究。西部开发，在民国时期已引起人们的重视。为此，我们开展了抗战前后国民政府西部开发政策研究，试图通过这一课题的研究，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在中外关系方面，研究的方向有所侧重：以西藏问题为焦点，研究民国时期的中英关系；以抗日战争时期华东地区的日伪关系、日军南京大屠杀为重点，研究中日关系的演变；我们还涉足学术界研究较为薄弱的20世纪30年代中德关系。在思想文化研究方面，我们的

研究重点围绕着民国时期自由主义思潮和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展开。在人物研究方面，对蒋介石、胡汉民、李宗仁等民国时期重要政治人物进行了全面的评价，给予实事求是的历史定位，跳出了传统的模式。

在取得上述重要科研成就的同时，本学科的队伍建设也取得重大进展，一批中青年学术带头人脱颖而出，他们思维敏捷，眼光敏锐，善于思考，勤于笔耕。部分中青年教师，以其优异的学术成果，在学术界已崭露头角，并占有一席之地，成为新世纪学科建设与发展的主体。他们分布在各主要研究方向，在教学、科研、研究生培养等方面承担了主要工作，有力提升了学科的综合实力与核心竞争力。最近，本学科获评江苏省学科梯队，就是突出的例证。在民国史领域，有陈谦平、陈红民、朱宝琴、申晓云教授；社会史、思想史领域，有李良玉、胡成教授；晚清与太平天国史领域有张海林、朱庆葆教授；当代史领域有高华教授。此外，还有一批博士、博士后学者加入学科队伍，他们学术素养优秀，知识面广博，且各有专攻，充满朝气与活力，成为本学科的生力军，显示本学科的队伍建设已经形成世代传承、不断发展与创新的优化机制，从而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借研究成果出版的机会，回顾本学科走过的漫长历程，我们一方面为师生们取得的学术成就感到自豪，另一方面，也深切体会到 21 世

纪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学术研究领域的竞争将日趋激烈，不进步不提高，就意味着落伍和倒退。新时代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让我们共同努力吧！

序 一

蔡少卿

对于东南亚华人秘密会党，我早就有心研究，改革开放后，我利用赴欧美讲学访问之机，搜集了大量相关资料。回国后，由于教学任务繁重，只写了一篇《论 19 世纪南洋华人秘密会党》的论文，一直没有写出一部有分量的专著。1998 年，邱格屏女士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随我攻读博士学位，由于她有较好的英语基础，我就将“东南亚华人秘密会党研究”作为她的博士论文课题，并将我搜集到的资料交给她使用。

三年学习期间，邱格屏兢兢业业，多方求索，刻苦钻研，勤奋写作，终于写成了这部三十余万字的著作。我作为书稿的最早读者，读后觉得有以下几点特色：

第一，论述全面系统，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自 19 世纪以来，约有数千万华人迁移海外，他们大部分侨居东南亚各国，对东南亚地区的开发和现代化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著名的东南亚史研究专家布赛尔

(Victor Purcell) 说：“如果没有中国人（指华工），就不会有现代的马来亚。”“如果没有现代马来亚的贡献（指橡胶），欧洲和美国的汽车工业，就永远不会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因此，东南亚华侨史一直是研究的热门课题，出版了很多著作。但是，对于在东南亚华人社会史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华人秘密会党，长期以来很少有人问津，尤其在国国内，几乎是个空白。邱格屏的这部著作运用历史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华人移民东南亚、东南亚华人秘密会党的形成与兴衰、成分与组织结构、东南亚华人秘密会党之间的关系及与主流社会的关系、华人秘密会党在东南亚地区的角色和功能等方面，作了系统的考察和分析。可以说，这是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东南亚华人秘密会党的专著，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第二，资料丰富详实，视野开阔。史料是史学著作的基础，以往很少有人研究海外华人秘密会党史，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资料的匮乏和难于搜集。邱格屏这部著作的写成，不仅充分利用了我从国外搜集到的大量英文资料，加以翻译、整理和考订，而且还到南京大学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搜集了大量相关资料。在充分掌握资料的基础上，作者从叙述和分析华人移民东南亚的历史，以及该地区华人移民社会的形成与特点入手，具体论述了东南亚华人秘密会党的形成、发展和衰落过程，分析了东南亚华人秘密会党与中国南方天地会的源流关系，以及它们在组织结构方面的异同，考察了它们在东南亚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的角色转换过程。本书不仅从宏观角度考察了东南亚华人秘密会党的形成和兴衰，而且从微观角度多层次考察了东南亚华人秘密会党的具体特点。这样，就使东南亚华人秘密会党的历史，以更丰满、更完整的面貌展示在人们面前。

第三，观点平实，不囿于陈论。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海外曾出版过几种研究东南亚华人秘密会党的著作，资料比较丰富，但作者大多站在殖民主义者的立场，从控制镇压华人会党的角度进行研究，对东南亚华人秘密会党性质的判断，有失公允。本书作者不囿于陈论，对东南亚华人秘密会党的历史分阶段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得出了与以往学者完全不同的结论。作者认为，东南亚华人秘密会党的演变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不同的阶段其性质也不一样。从华人会党在东南亚出现到 19 世纪 40 年代前后，它们是代表全体华人利益的共同体；从 19 世纪 40 年代到 20 世纪 30 年代，它们成为各方言群体的经济利益代表；抗日战争时期，它们成为抗日爱国团体；战后，它们就裂变为政治团体和新的华人帮派。我认为作者对东南亚华人秘密会党史的分析评论是符合实际的，是客观、中肯的。

第四，对以往著作中出现的一些人名、地名作了考订，纠正了不少错误。在邱格屏从事这项研究之初，我曾对她说：“你在未来的研究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不仅是英文资料的理解和翻译，还有英文中夹杂许多闽南话和广东话的问题。”果然不错，她在研究中发现，许多人名、地名以及一些专有名词，都成了极为棘手的难题。由于英文资料中的华人姓名都是从闽南话和广东话直译过去的，很多引用或翻译这些英文资料的学者在未弄懂这一事实之前，就将这些人名、地名译成普通话。结果这些人名、地名不仅与中文原名大有出入，而且不同的引用者翻译时所使用的字眼也不一样，这就造成同一个华人有多个姓名，因而本是同一个人的活动，在不同著作中就可能被说成是不同的人所为。邱格屏仔细翻阅了宗乡会馆刊行的族谱、纪念刊物，并查阅被引用著作的英文原件，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使多年来一直以不同

姓名出现的同一个人的身份得以确定。在地名方面，由于东南亚华人对当地的地名、街道都有约定俗成的称呼，但国内不少学者在引用这些名称时，往往直接由英文或巫文翻译，连东南亚华人也不明白其所指。邱格屏又通过对照华侨学者的著作及东南亚的中英文地图，校正了一些地名译文的错误。这些工作看起来细小琐碎，但却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总之，我认为本书的出版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我们全面认识海外华人华侨的历史，做好海外华侨的联谊工作，也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本书作者邱格屏女士是一位勤奋好学、悟性很强的青年学者，我希望她能继续努力，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是为序。

2003 年 7 月 25 日于南秀村寓所

序 二

秦宝琦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国际地位的迅速提高，华人、华侨的历史已经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国内不少高校和科研单位还专门建立了研究华人、华侨历史的研究机构，出版了大量有关华人、华侨历史的论著。但是，对于华人、华侨历史上重要群体——华人秘密会党的研究，却显得十分薄弱。迄今人们能够看到的有关著作，大多出自国外原英属海峡殖民地、荷属东印度群岛（今印度尼西亚）殖民官员之手。他们研究东南亚华人秘密会党的目的，无非为了适应西方殖民统治的需要，在初期是为了利用华人秘密会党，以达到“以华治华”的目的，后期则是为了弄清秘密会党的内幕，以便加以镇压。因此，很难从这些著作中看到对东南亚华人秘密会党的真实历史和客观、公正的评价。20 世纪以降，一些西方学者也开始研究东南亚的华人秘密会党，不过在他们笔下，华人秘密会党或者被说成是西方“共济会”式的组织，或者被描绘成暴徒、匪帮和从事烟赌娼和绑架、抢

勃的黑社会，定性为扰乱当地社会治安和颠覆当地政府的犯罪团体。中国大陆学者虽然不同意这些看法，但是，以往却鲜有学者以有分量的著作加以驳斥和澄清，这使从事华人华侨史和中国秘密社会史的学者感到深深的遗憾。邱格屏博士的专著《世外无桃源——东南亚华人秘密会党》，则为我们弥补了这个缺憾！

近年来鉴于国内外黑社会势力的猖獗，内地一些作者往往把历史上的天地会和海外洪门看作是暴力团体或黑社会组织，这也是需要加以澄清的。尽管我们不同意以往国内一些学者只看到历史上天地会等秘密会党的光明面而忽视其负面作用和影响的做法，如把这些秘密会党看作“民族革命团体”或“农民革命组织”，但是，把历史上的天地会和海外秘密会党不分青红皂白，一律视为“黑社会”或“有组织犯罪团伙”，显然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首先，历史上的天地会和海外洪门尽管有诸多弱点，但不应忽视其积极意义。天地会作为民间秘密结社，平时主要是在成员之间施行互济互助和自卫抗暴，在社会矛盾激化时，则领导成员反抗国内封建统治和参加抵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如太平天国时期的上海小刀会起义、厦门小刀会起义、两广天地会起义，辛亥革命时期参加革命党人领导的历次武装起义，这些都是近代历史上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外洪门也主要致力于团结华人、华侨，在成员中间施行互济互助，反抗殖民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的剥削与压迫。尽管少数海外华人当中的三合会变成了黑社会组织，但大多数华人秘密会党并非如此。其中有的洪门组织在住在国已经成功地融入主流社会，成为合法的社团，为当地的经济做出重要贡献。由一部分海外洪门成员中的归侨组成的中国致公党，则从旧式帮会转化为民主党

派，不仅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做出过贡献，而且积极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为团结广大海外洪门和华人华侨、为完成祖国统一而做出不懈的努力。

其次，中国内地还有一种误解，有人把洪门认作“会道门”，认为会道门中的“门”就是指“洪门”，这种说法更是毫无根据。在抗日战争时期会道门投降日寇，一贯道的头子张光壁曾疯狂地叫嚷：“日本皇军打到哪里，道就宏到哪里！”后来又与国民党特务机关合作，积极反对人民革命。新中国建立后，会道门散布迷信思想，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所以被依法取缔。而人民政府对于洪门等旧式帮会，则采取了另外一种政策。鉴于帮会这种落后组织在人民政权建立后，已经失去昔日在群众中施行互济互助、自卫抗暴的功能，责令其自行解散，不准继续活动，其首领有罪恶的，犯什么罪，按什么罪处理。国内帮会中的洪门、青帮、哥老会等便是按照这个政策自行解散，而不是按照取缔会道门的政策予以取缔的。所以，洪门与会道门是毫无联系的两码事，人民政府从来没有把洪门看作是会道门，对此也必须加以澄清。

《世外无桃源——东南亚华人秘密会党》一书，是作者在博士论文基础上经过几年来的充实、提高后完成的。本书最突出的特点，不仅在于史料翔实、论据充分，更主要的是作者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东南亚华人秘密会党的历史给予真实的反映，对其功过是非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指出：“东南亚华人秘密会党所关注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在异国他乡谋求生存，如何发财致富，以便衣锦还乡，而不是颠覆当地政府。东南亚华人秘密会党虽曾因相互械斗而有害于正常社会秩序，但他们更多的时候起着整合华人社会、稳定当地社会秩